

# “儿童军”：长征到达陕北第一军

长征，是超越时空的丰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这是长征中最年轻、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 A “儿童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两支红二十五军。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由“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士的子弟”，于1932年11月重建部队。在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中，“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也不过34岁，韩先楚、陈先瑞、刘震、刘华清等都在20岁上下。这是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也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以英勇善战成为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师劲旅。

鄂豫皖根据地在敌人长期反革命军事“围剿”下，被敌人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大块，红二十五军处境日趋艰难。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实施战略转移，成为各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

## B “儿童军”进军陕南

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后，蒋介石乘其孤军远征之际，调集第47师、第54师和第115师组成追剿队跟踪追击，企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消灭红二十五军。为摆脱敌人重兵追击，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最快速度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实现了战略转移时的既定方针——进入桐柏山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遗憾的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却发现桐柏山的地理条件对创建根据地十分不利：紧靠平汉线、襄樊线及汉水，红军能够获得回旋余地十分狭小；此外，当地的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相对薄弱，加上敌人重兵压境，这样的生存环境，可以预料部队将难以在桐柏山区获得发展。据此，红二十五军果断放弃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转而进军伏牛山区。兵贵神速。为甩掉尾随的敌人，实现进军伏牛山的战略方针，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挥师北上。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急令第40军第44师在老河口（今光化）、南阳、方城一线迎头截击。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与敌40军1个旅及骑兵团在方城的独树镇发生遭遇战。这一仗，由于红二十五军暴露在地形平坦的不利环境下，处境十分危险。为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儿童军”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挫败国民党的合击，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如同桐柏山区存在诸多不宜创建根据地的因素，伏牛山区也存在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因素。如果部队留在伏牛山，可以预料，下一步将难以获得大发展。红二十五军再度变更战略方针，决定西进，从伏牛山入陕南，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从伏牛山入陕，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是入陕之路。敌人在隘口重兵布防，控制入陕大道。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深山峡谷隐蔽前进，绕过敌人防线，打破了2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9日翻越蟒岭，进入陕西洛南县。“儿童军”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进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开辟鄂豫皖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克服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以及人地生疏、给养不济等重重困难，相继打破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粉碎了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在鄂豫陕站稳了脚跟。

## C “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

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冬奉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主力红军的消息更是一无所知。直到1935年7月13日，在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并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界集结，妄图围堵消灭红军主力于川西地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获取的这些消息在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送达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

鄂豫陕省委审时度势，于1935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以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能够通观全局，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不仅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实现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同时也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相吻合。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西征北上的行程。红二十五军西出秦岭、北渡渭河，以20多天的急行军直抵静宁城下，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切断。西兰公路被切断以后，红二十五军紧紧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10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先行北上策应主力。当“儿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这些在敌人眼里不过是“地上跑的小兔子”，却把自以为是的“天上飞的老鹰”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直捣敌人后方的红二十五军，在钳制了敌人，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后，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尽管沿途人烟稀少，部队无粮可筹，饥疲不堪，但在严重的饥饿死神威胁面前，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退却。

“儿童军”以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意志西征北上，前出陕南陇东两个月，行程4000余里，沿途攻克了3座县城，进行了大小战斗10多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1936年底出版的《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刊载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所评价的：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

9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永宁山，取得北上入陕的伟大胜利。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既是西北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前奏，也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北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一曲信天游，由衷地唱出了陕北人民喜迎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的兴奋之情，也宣告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胜利落下帷幕。

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表现出来的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召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度评价“儿童军”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诗篇。193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指出：“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也盛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卓爱平 刘亚岚

## 往事

## 钩沉

每到考试季，网络上就会传出一个段子。这个段子是两份名单：

第一份名单有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等人；第二份名单是顾炎武、李时珍、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李渔、蒲松龄、洪秀全、盛宣怀、袁世凯等人。然后提问，以上名单中，哪一组的人认识得多一些？

答案揭晓，前者全是曾经的科举状元，后者全是落第秀才。的确，通过科举考试，古代读书人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但是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是少数人。毕竟在考试中，除了实力，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在“落榜”的读书人中，依然有不少获得了不凡的成就。

## 孟浩然 未考取功名 隐居鹿门山

孟浩然(689-740年)，生于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的书香世家，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孟浩然科举落榜，加之仕途困顿，后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孟浩然留下了诸多著名的诗篇，被誉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孟浩然坎坷的“功名”之路非常坎坷。孟浩然年轻时隐于鹿门山，一心苦读诗书，弱冠之后，辞亲远行，广交八方朋友，拜见公卿名流，以求有取士的机会。开元十二年(724年)，因唐玄宗在洛阳，孟浩然便前往洛阳求仕，却一无所获。

两年后，孟浩然从襄阳出发去扬州，途经武昌，他与小他十二岁的李白约好在武昌相遇，两人在短短的相处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分别时，李白在黄鹤楼作诗为孟浩然送行，写下了千古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开元十五年(727年)，快要四十岁的孟浩然，第一次赴长安进行科举考试。第二年年初春，孟浩然在长安作《长安春望》诗，抒发渴望及第的心情，然而，那一年，孟浩然科举不中。就在这一年，孟浩然与王维结交，王维为孟浩然画像，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据《唐摭言》中记载，科举未中后的一年，孟浩然游长安，王维想推荐他做官，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一天，王维在官禁中当值，私自邀请孟浩然到当值处谈话。不料突然报说唐玄宗来了，王维慌忙让孟浩然躲藏起来。等到玄宗来了之后，王维又觉得不把孟浩然在这里的事奏明皇上很不妥当，说不定会引来欺君之罪，于是王维就奏明了皇帝，玄宗倒并不计较，他也是久闻孟浩然的诗名，于是当场召见了孟浩然。孟浩然向皇帝谈诗，可当读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句时，玄宗就有点不高兴了，说：“脚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孟浩然虽然说自己“不才”，但皇帝听得出来，这是以自嘲的形式发牢骚，所以玄宗不高兴是自然的。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孟浩然返回襄阳鹿门山隐居。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伯乐韩朝宗，人称韩荆州，李白曾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荆州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严武与蒋沆等人。

韩朝宗约好了孟浩然一起去京师长安，孟浩然正跟朋友喝酒，家人催促他说：“别喝了，你跟韩先生约好的，你们不是要去长安面试吗？”

孟浩然说：“都已经喝成这个样子了，还管他呢。”

真实性情的孟浩然错过了又一次入仕的机会。

## 李贺 因避讳而被迫远离科举

说起科举不仕的原因，不外乎成绩不够，不过，对于才华出众的唐朝诗人李贺来说，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因为“避讳”而远离了科举考试。李贺(791-817年)，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李贺先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他属于唐宗室的远支，因“皇室后裔”身份，他常被称“唐诸王子李长吉”。

李贺小小年纪就聪慧过人，才智出众。21岁的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并一举考中，年底赴长安应试进士科。可是“阖闾未开蓬荜户”，麻烦来了，竞争者为李贺父亲李晋肃名字中的“晋”与“进士”中的“进”字音同，而犯家讳应避讳退场。按当时的规矩，考生若发现试题中出现祖上的名字，便要告假说肚子疼，退出考场。李贺仅仅因早逝的爸爸的名字而不能参加考试，他那黯然离去的背影，包含着多少委屈和无奈。后来韩愈愤而作《讳辩》，文中质问：“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做人了吗？”成为当时韩愈爱才荐才的佳话。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不同时代对避讳的要求有所不同。唐太宗李世民在唐高祖时曾做过宰相，高宗以后为了避讳，宰相更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避唐王之名。杜甫的父亲名字叫“杜闲”，杜甫在诗中不用“闲”字，是为避尊亲之讳。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的一位门客在冯府读《老子》时，将“道可道，非常道”读成“不可说，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也是为避府主之讳。

一年后，李贺因病辞去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回到了老家。四年后，27岁的李贺郁郁而终。

尽管一生短暂，在生前没有考取功名，但并不妨碍李贺在诗歌上的成就。李贺给世人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等千古佳句。后来，他与李白、李商隐合称为“唐代三李”。晚唐李商隐、杜牧都曾为他写序作传。光化二年(899年)，李贺亦被迫赠为进士。

## 唐伯虎 被“考场舞弊案”冤屈的一生

要说科举经历坎坷者，不能不提唐伯虎。唐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1470年3月6日)，按照天干地支，这一年是庚寅虎年，他在家排行老大，名唐寅，字伯虎。

唐伯虎16岁参加秀才考试，29岁参加应天府试，考中第一名，后人也因此称他“唐解元”。30岁赴京会试时，他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

当时，唐伯虎赴京参加会试，路上巧遇江阴“富二代”徐经(就是旅行家徐霞客的曾祖父)，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一同赴京赶考。

徐经、唐伯虎到京后，两人多次前往礼部侍郎程敏政家“蹭饭”。程敏政为当年的主考官，由于那年出题偏，考生相顾失色，感叹题目太难。阅卷时，阅卷官梁储拿着唐伯虎的文章给程敏政品评。程敏政读完也觉得文章写得十分精彩，情不自禁地说：“只有徐经、唐伯虎文章最好。”结果，这句话被平时忌恨程敏政的华昶听到，于是华昶回奏孝宗皇帝，程敏政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泄题，若不严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之心。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孝宗皇帝下令彻查，于是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被关入大牢。徐经入狱后经不起严刑拷问，招认收受程敏政的家童来获取考题，并将试题泄露唐伯虎。后经刑部奏孝宗皇帝，程敏政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泄题，若不严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之心。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唐伯虎出狱后，因为此案，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徐经此后官运亨通，程敏政则引咎辞职，削职归田。经历这场不明不白的“牢狱之灾”后，唐伯虎自然也对科举心灰意冷，他以卖画为生，其才华声名远扬。正德年间，唐伯虎应宁王朱宸濠的邀请赴南昌为其效力，但后来却发现宁王有篡权不轨之心，宦海沉浮，实难久恋，唐伯虎只好装疯卖傻逃离宁王府。

## 蒲松龄 因考试失误而被取消资格

蒲松龄(1640-1715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现属淄博市)蒲家庄，父亲蒲槃因科举不第而弃儒从商，赚得相当丰厚的家产，但仍不能忘怀于光复门庭，于是弃商归田，教书教子。

蒲松龄9岁开始读书，19岁初应童子试。不过，此后蒲松龄在科场奋斗数十年，届届都不中。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秋，山东乡试正式开考。号舍内，年届48岁的蒲松龄觉得很有把握，奋笔疾书，写满了好几页。古代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则，每页写十二行，每行写二十五字，且必须按照页码顺序书写，不巧的是，蒲松龄匆忙间竟漏了一页未写，后来他发现时，自己被吓得魂魄出窍，“惊损六叶连肝肺，唬坏三毛七孔心”。在当时越稿(俗称跨页，页码不相连接)须受处罚，甚至被黜落。蒲松龄也因越稿而被取消考试资格，还被张榜公布于世。此后，蒲松龄在家著书立说，晚年留下了一部洋洋洒洒数十卷的《聊斋志异》，得到当时主政山东的学政施闰章的称赞，“观书如月，运笔成风。”自此，蒲松龄声名大振，书未脱稿，便在朋辈中传阅。蒲松龄72岁时，被破例补了个贡生。

《聊斋志异》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名叫叶生的淮阳学子，他的文章天赋首屈一指。一天，淮阳来了个新知县丁乘鹤，他很欣赏叶生的文章，让他住在县衙内读书，还经常用钱接济叶生。县里预考叶生夺得第一后，丁知县对叶生抱有更大的希望。谁知，叶生时运不济，考试落榜。叶生很沮丧地回到家。后来，叶生面容日渐消瘦，神情也变得痴呆，不出叶生病逝。病逝后，他的魂魄竟然跟着来到了知县家，还教了知县的儿子考取了功名，丁公子考中一年后，自己也考中举人。叶生得意地返回自己家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蒲松龄借叶生的故事，讲述了自己科举上落魄的经历。 □王东志

# 影响大江南北的路德先生

路德，出生于终南山下西安周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清代著名教育家。为西安书院内关中书院主讲老师，在关中书院历史上，授徒时间长，培养学生多，首先要数这位路德先生。关中书院在清代，乃是响彻西北和国内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这所学府是明代万历时期，大儒冯从吾在此讲学，由于听讲学生多，校舍难以容纳，冯从吾予以扩大校园。到清已成规模，逐渐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关中书院。今天说路德先生，其实西安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他，可以说鲜为人知。而陕西及西安的一些辞书和典籍中鲜见他的名讳。但这并不影响这位清代教育家卓卓不凡的声望。

路氏为享誉一方的名门世家，族人多有成就者，出过3位翰林、5位进士。

路德于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中甲榜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户部湖广主事，兼军机章京，方略馆协修，中宪大夫。可正当他大展宏图之时，却因患眼疾归乡养病。

仕途前程虽然断了，但他并没有消沉。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受聘关中书院，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换。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投身教育，著书立说，为弘扬关学而授徒育人。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以知识使自己成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他要求学生先立品行，后做文章。他给学生讲诚信说：“有志偿债者，不敢负债；有志全交者，不敢滥交；有志酬恩者，不敢受人恩。”

路德为国家、为陕西培养了一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栋梁之才。

路德初为翰林时，一件趣事，特别有意思，成为文坛佳话。那是嘉庆己巳年，路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跟随陶澍先生习翰林之道。一天，陶澍给路德写了两个字“盱眙”，但是身在北方的路德却没见过这两个字，陶澍便说这两个字读“xuyi”，是江苏名县，亦是陶澍的家乡，此时路德肯定是既尴尬又惭愧。当然有“陕西第一佳士”的路德，岂肯甘拜下风，于是顺势也给陶澍一书两个字“整屋”，没想到，身在南方的陶澍也没见过这两个字，路德便介绍这两字读“周至”，是陕西名县，也是路德的故里。陶澍同样有点难堪，遂解嘲道，这可真是“北不识盱眙，南不识整屋。”在场的翰林们闻之皆笑。后来，翰林院的翰林们便以“北不识盱眙，南不识整屋”这句谚语来形容南北方的差异，流传至今。

近代历史名人、清廷重臣的曾国藩，特别推崇和佩服路德，他没有忘记西北长安有个路德先生。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公乃国大精神之典范”“足为吾人之师表”。

曾国藩本人在治学等方面就有很高成就，被胡哲敷赞叹为：“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为清朝的曾国藩。”但曾国藩却感觉和路

德相比，还有相当距离。他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大赞路德：“陕西近三十年科举中人，无不出闻(路德的字)先生之门，湖北官员中想亦有之名。”曾国藩不断告诫儿子，将路德推荐给儿子，让其作学问还是做人，是必有其道理的。他说：“闻近日精于举业者，言及陕西路闰先生在(仁在堂篇)及所选仁在堂试帖，律、赋、课、艺，无一不当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见此书，仅见其所著《怪学馆试帖》，久为佩服。”曾国藩这段话给儿子的话，足可知路德在曾国藩心目中有多么大的分量。并给他的另一个儿子纪鸿与瑞侄等书中有：“须买《仁在堂全篇》《怪学馆试帖》，悉心揣摩。”

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对路德的评价更高。他说路德“行谊为文名所掩，其诗古文又为时艺试律所掩”。人们只看到路德是字字大师、八股大家、时艺宗师，实际上路德还有画、剪纸、诗、文章等其他方面的造诣，这个评价反映了路德学识渊博，涉猎面之广而精，但世人却是以八股和试帖诗而重视他，这其实是路德的一种全面评价赞誉。

路德先生，不光影响了曾国藩父亲及幕僚，就连一些成就了大事業者，也深受路德影响。

晚清四大名臣“张之洞”对路德亦推崇备至。同治十五年，张之洞在四川完成其著作《劝学篇》，并指示巴蜀士子读书的门径，所推荐必学的书目内，路德的《仁在堂时文》赫然位居前列，张之洞还说要“涉猎千余篇，烂熟数百首”。

经他教授的学生达千人之众，许多弟子后来都成为名家。晚清著名的东南大学士、救时宰相、财政大臣阎敬铭便是路德在关中书院讲学时拜入门下的弟子。

这就是陕西周至走出的路德先生，虽名不甚显，但令人疑惑的是，他却能得到五百年后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儒雅风流人物”曾国藩的敬重和推崇，并影响到大江南北。因之作为陕西的文化人，确实应当认真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位胸括万殊，深藏不露的路德先生。 □朱文杰

## 人物春秋

